

评《文学还能更好些吗》

廖四平 张 倩

李建军的《文学还能更好些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以下简称《文学》)是一部论文集,除“自序”外,共三辑:第一辑由几篇论述文学批评的理论问题以及当代文学批评现状的论文组成,第二辑是几篇对有影响的小说进行“质疑性批评”的论文,第三辑包括几篇“反驳性的‘批评的批评’”和侧重肯定性论述的论文。

总的来看,《文学》具有如下特点:

一、敢于质疑

《文学》所论述的对象虽然或为名家,如莫言、贾平凹、阎真、阿来、孙皓晖、马尔克斯、章诒和、迟子建等,或为名作,如《檀香刑》《废都》《沧浪之水》《尘埃落定》《大秦帝国》《百年孤独》《刘氏女》《泥霞池》等;但是,除对马尔克斯及其《百年孤独》外,都有明确的“质疑”,即使是对给予了充分肯定的章诒和的《刘氏女》和迟子建的《泥霞池》也如此:“《刘氏女》……被‘我’给绊住了……作者……如果选择了全知的第三人称叙事,她遇到的麻烦可能会少得多”,“迟子建在处理《泥霞池》结尾的时候,似乎替人物和读者想得太周到,写得太细密,没有止于所当止”。

二、以“真、善、美”为标准进行批评

《是大象,还是甲虫——评〈檀香刑〉》《大象的重量与甲虫的颜色》等基于“真、善、美”的标准对莫言的《檀香刑》进行了批评,认为:“《檀香刑》‘叙述是夸张的,描写是失度的,人物是虚假的……人物的关系和行为动机经不住分析,人物的语言的个性化和合理性也经不起细究’,‘缺乏细节描写的分寸感和人物性格处理的合理性,缺乏那种令人震惊的客观真实效果……缺乏真正的现代主义文学叙写人的异化性生存境况的深刻性和现实感’;从文体的角度来看,它过于有意识地接受了山东地方小戏‘猫腔’的影响,因而,缺少自身应有的创造性、生气性,缺乏一种能让人慢慢地、细细地品味的劲道,给人以一种

拘泥于模仿和追求形式美的感觉;就语言而言,小说则可谓毛病多多,如文言白话随意地混杂而用、修饰语不恰当、不符合语法规则、违反通常的逻辑、比喻没有新意、词句拖泥带水、措辞不够严肃等。《那些优雅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评〈废都〉》《驳庸俗的血亲主义批评》等认为:贾平凹的《废都》“是一部缺乏真实感的作品”——它“关于‘名气’的情节事象的抒写……是夸张的、虚假的”,“写庄之蝶在‘千米左右’的地方看见了阿灿……庄之蝶在阿灿上车的短时间内跑完一千米的距离”,“‘庄之蝶抱了妇人,两人再没有说话,浑身颤抖着,使得那丁香树也哗哗地摇着响,惹得不远的一对男女往这边看’……‘浑身颤抖’竟然会把树‘摇着响’”……这些显然“不真实”;同时,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它缺乏应有的纯洁性,不能推动人向善向上;从思想的角度来看,它没有足够的深度和丰厚的意义;因此,总的来看,它是一部“颓废”“陈腐”的“旧小说”,堪称是福克纳所谓的描述“人类内分泌物”的典型。《没有装进银盘的金橘——评〈沧浪之水〉》一方面从善的角度认为《沧浪之水》的主题很有价值——它揭示了作为个体的人因其人格被异己的社会扭曲而产生的人生幻灭感,另一方面又从真和美的角度认为它是“有得有失,瑕瑜互见”——既塑造了池大为这个“有新意的人物形象”,又存在着“不成熟的讽刺与过度化议论”“人物被遮蔽在作者的阴影里”等缺憾。《像蝴蝶一样飞舞的绣花碎片——评〈尘埃落定〉》认为:无论是从内容方面来说,还是从写作技巧运用的角度来看,《尘埃落定》都有很多能让人产生“陌生感”、获得独特的审美感受的地方;但是,从叙述、语言、寓言修辞以及作家对作品中人物的态度、对作品主题的建构等方面来看,它又是一部“应该进行质疑性批评的作品”,并进而认为该小说是“像蝴蝶一样飞舞的绣花碎片”。

三、注重根据不同的对象运用不同的批评方法

总的来看,《文学》注重对批评方法的运用,但又往往是根据不同对象的特点来选择运用不同的批评方法的,如阎真的《沧浪之水》、章诒和的《刘氏女》、齐邦媛的《巨流河》等小说蕴含着相当丰厚的“社会”“历史”内涵,相关的评论便主要运用了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莫言的《檀香刑》、阿来的《尘埃落定》等小说的文辞“别具一格”,适合于“细读”,相关的批评便侧重于对新批评方法的运用;庸俗的血亲主义批评”、贾平凹的《废都》等深涉“道德”问题,《驳庸俗的血亲主义批评》及有关《废都》的评论便着重运用了道德批评方法;而《批评与创作:失去对称的两翼》则根据“批评”“创作”的“文化”性而运用了文化学批评方法。

四、论述透彻、生动、具体

(一) 透彻

《文学》对问题的论述相当透彻:

首先,它在展开论述时不仅能有的放矢、一语中的,而且有些论述具有“穿透性”——甚至堪称“鞭辟入里”,如有关《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这一人物形象的论述即如此——认为:池大为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滑稽性质”和“讽刺意味”的悲剧性人物,其悲剧性不仅仅在于他在日常性的生存压力下向生活妥协,通过出卖同事及讨乖卖巧等手段来赢得其上司马厅长的信任和获得权力、房子等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还在于他一旦进入体制的内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便在行为、做派等方面与自己过去所厌恶甚至敌视过的那些体制内的人实际上是并无二致,也就是说,两者实为“一丘之貉”——这便非常准确地揭示了池大为的悲剧本质。又如,对《废都》获法国文学奖之事,相关的批评从人的心理层面进行了论述,认为《废都》之所以能赢得法国“女评委”的青睐,让她们各自把手中仅有的一票投给这部“大作”,是因为这样的作品“印证”了她们对“妻妾成群”“颓废堕落”的“中国文人”的想象,满足了她们对古老而又遥远的“东方文化”进行想象和评价的冲动;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她们变态性的“意淫”的结果——这便相当深刻地揭示了《废都》获法国文学奖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旁征博引、“万箭射的”,如《文学批评:若无盛气会怎样》一文篇幅并不大——仅六千多字,但所论及的“经典”就有数十部之多——包括《易经》、曹丕的《典论·论文》、刘禹锡的《答柳子厚书》、韩愈的《答李翊书》、在利维斯的《伟大的传

统》、马克·斯洛宁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布鲁姆的《西方的正典》、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等中外著名的经典,从而,相当深刻而又令人折服地论述了文学批评的“盛气”这一问题。

第三,注重比较论述。如《那些优雅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评〈废都〉》详细地比较了《废都》与《红楼梦》《金瓶梅》等古典小说里人物的语言,从而,言之凿凿地论述了贾平凹是通过“拙劣的模仿来描写人物的对话”这一观点《穿越黑暗的文学远征——经典文本比照下的〈刘氏女〉》通过与中外经典,如台湾李昂的《杀夫》、前苏联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等的比较,论述了章诒和的《刘氏女》是一次“穿越黑暗的文学远征”

(二) 生动

《文学》精心地遣词用语,因此,语言相当生动:

1、有意识地选用一些能精准地表情达意的书面词汇和文言语句,如“浮屠”“撙节”“自馁”“孜孜矻矻”“硁硁”“窳败”;“五经无真字”;“言出患入,言失身亡,故圣人当言而慎,发言而忧,常如临危履冰,以大居小,以富居贫。”“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千古以后乎”;“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沾沾煦煦,柔润可人,丈夫之大耻也”;“惟知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

2、使用了一些蕴含着哲理、闪耀着思想光芒的语句,如“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不是某些伪‘大师’的轿夫或假‘天才’的‘宣传部长’”,“对于名的贪婪很容易转化为对于性的疯狂的占有欲。”“虚构不等于虚假。虚构并不是目的,而只不过是手段而已——虚构是为了追求更高意义上的真实”;“利用小说‘为国家与民族争取文明话语权’,就像‘利用小说反党’一样,都是不可思议的‘野心’”;“愚昧是暴政存在和肆虐的基础;哪里有低素质的‘群众’,哪里就容易滋生暴君和独裁者。”“监狱是关押罪犯的地方,也是关押无辜者的地方;是社会败类的归宿点,也是社会精华的集聚地……监狱生活既是文学叙事的题材,也是给作家的意志淬火的地方。”

3、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1) 比喻:“很多时候,‘学院化’……把‘学术规范’变成了僵硬、刻板的教条,把批评异化为冷冰冰的‘尸体解剖’”,“像对大自然‘情有独钟’一样,迟子建对‘神话’同样一往情深;像把北方大地当做精神家园一样,她把神话也当做自己的‘梦开始的地方’。”“迟子建的纯净而执着的写作,仿佛夜静天凉月华开,让

我们看到了别样的风景,感受到了温暖而美好的宁静感,一种离大地和诗最近的感觉。”(2)排比:“它(《废都》的出版)标志着知识与权力的临时同盟的终结,标志着在写作领域娱乐道德观开始取代行善道德观,标志着利己的私有形态写作开始取代利他的社会化写作,标志着理性、道德、责任和良知的瓦解,标志着服从市场指令的写作倾向和出版风气的形成”;“个性千差万别的人,处境各各不同的人,被草率地区分为好人和坏人,被简单地划为敌人和朋友,被随意地贴上进步和落后的标签。”(3)对比、对偶:“‘求真’的文化通常指向事,‘为善’的文化通常指向人;指向事则以事定然否,指向人则以人论是非;指向事则论迹不论心,指向人则舍事而诛意;求真’的‘批评型文化’具有鼓励思考、保障自由的积极倾向,而‘为善’的‘人情型文化’则具有束缚思想、限制自由的消极倾向,“一个高明的批评家……不是囿于褊狭的好恶,将山羊说得比骆驼还高,或者,出于利害的考量,把麻雀说得比孔雀还大。”“我见过为暴政百般辩护的,但没见过这样辩护的。我见过歌颂暴君到狂热程度的,但没见过如此狂热的”(4)反问:“即令我过去一直都‘处处’讲贾先生的‘好话’,难道就不可以在他的创作出了问题的时候说说他的‘坏话’吗?即使对同一部作品,过去说过‘好话’,但情随事迁,学随年进,后来又有了新的甚至完全不同的感受、认识和判断,谁又能剥夺人家以‘坏话’的形式说出此时此刻的真实体验和真实思想的权利?难道对一部作品的这一方面说过‘好话’,就不能对同时对它的那一方面说说‘坏话’吗?”

4.注重征引名人名言,如“把友谊放在真理之前是错误的。”(亚里斯多德)“谁若不能指出伟大人物的过错,谁也就不能欣赏其长处”;“批评应侧重伟大人物的不足;若由于偏见连他们的毛病也欣赏,那么不久我们会步其后尘。那么我们从名家那里得到的启示,或许便是如何将作品写坏了”(伏尔泰)。“伟大的文化使者怀着大的热情传播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使之蔚然成风,使之传到社会的上上下下、各个角落”(马修·阿诺德)。

(三) 具体

在阐述问题时,《文学》往往既正面立论,又“例释”,因此,阐述很具体实在,具有“可感性”;同时,对文学批评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文学批评的文体、文学批评的写作等,《文学》没有进行正面的阐述,而是通过一些具体的论文进行“例释”的,如通过《是大象,还是甲虫——评〈檀香刑〉》《那些优雅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评〈废都〉》等“例释”了“作品论”及其写法,通过《在大地和苦难中孕育的哀愁之美——论迟子建创作的精神风貌》“例释”了“作家论”及其写法,通过《大象的重量与甲虫的颜色》《驳庸俗的血亲主义批评》等“例释”了驳论体文学批评及其写法,通过《穿越黑暗的文学远征——经典文本比照下的〈刘氏女〉》《如此感伤,如此温良,如此圣洁——论〈巨流河〉》等“例释”了文学批评写作的步骤和技巧——文学批评写作中的“阅读和感受”“选题、立意和运思”等步骤和在“复述”“描写和论证”“文字与结构”等方面的技巧得到了具体的演绎……这样,“作品论”及其写法、“作家论”及其写法、驳论体批评及其写法、文学批评写作的步骤和技巧等问题便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能让人可感可触的阐述。

此外,在阐述问题时,《文学》常常把文学批评与社会批评结合在一起,如在论及“话说得对不对,不是问题,是谁说的,才是问题”时,联系到“柯庆施的‘相信到迷信的程度’与‘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之类的疯话”;在论及“即使到了现代,批评仍然不是一种能被宽容地理解和对待的事业”时,联系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批评家龙应台因进行尖锐而理性的批评而遭遇严重的误解和充满敌意的报复——“有人甚至把‘撕了一角的冥纸’寄给她”的事例;把文学与现实的政治生活联系在一起进行论述——认为:正如政治生活中的“民主的气质”有助于人们对权力腐败的遏制一样,文学领域里“包含着批判的精神和反对的态度的宝贵‘气质’”有助于防止作家滥用写作的权力——包含着成熟的“民主气质”的质疑和反对甚至是创作的助力……这样,能让人产生强烈的现实感。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国际化研究中心)